

翻译研究

## 翻译学构建中的知识生产

胡作友 窦金昌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翻译学的构建是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的动态过程。作为跨文化知识传播的核心媒介,翻译不仅促进语言转换与知识生产,还通过理论与实践互动推动学科体系化。知识翻译学将知识视为翻译的本质内容,强调其贯穿翻译全过程,推动学科范式革新。翻译学的知识属性体现为发展性与动态性,要求学科持续回应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本体译学聚焦翻译本质的元思考,通过文化转向等研究深化理论体系;关系译学则借助跨学科融合拓展研究边界。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本体译学提供学科根基,关系译学通过多学科视角反哺理论创新。知识生产机制推动了翻译学理论的深化,为应对社会的文化挑战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彰显了翻译学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学科活力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翻译学;本体译学;关系译学;知识翻译学;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144-11

### 0 引言

当代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对翻译学提出了全新要求,推动着学科内涵的持续深化。在专业翻译领域,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实践层面的需求,也是跨文化交流与知识生产的基础性环节。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术语为例,其翻译标准化工作是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基础(王姗姗等,2024:163)。同样,作为中医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脉象学,其术语翻译的规范化直接关系到中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效果(梅明玉等,2024:152)。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翻译研究的版图,机器翻译质量评估和人机协作模式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课题。如何有效应对 ChatGPT 等新技术带来的翻译伦理问题(王贇等,2024:95),成为翻译学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新发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改变了翻译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促使学科建设以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完善为根本出发点。

收稿日期:2025-07-1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翻译批评的控场力与批判力研究”(AHSKD2024D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作友,男,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西方文论研究。

窦金昌,女,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胡作友,窦金昌. 翻译学构建中的知识生产[J]. 外国语文,2026(2):144-154.

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知识翻译学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知识翻译学突出强调翻译研究的知识维度(杨朝军等,2023:87),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都渗透着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从实践层面的语言转换到理论层面的概念建构,再到学科层面的体系化发展,知识始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翻译学理论构建的认识论基础。

翻译学与知识翻译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翻译学的学科构建需要充分吸纳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成果,以应对知识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知识翻译学对翻译本质的重新界定,为理解翻译在知识传播和创新中的独特功能提供了全新视角。另一方面,知识翻译学的发展必须依托翻译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人类知识体系的跨文化传播与创新。尽管知识翻译学为理解翻译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但学界对知识维度的探讨仍显不足。多数研究仍将知识视为翻译过程中的附属因素,而非贯穿始终的核心要素,从而制约了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翻译学构建中的知识生产,揭示推动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 1 翻译学建构中的知识论基础

知识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出发,会有不同的理解。哲学家认为,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1970:15)认为,知识并非源于主体或是客体,而是源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知识是人类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主客体互动实践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动态认知体系。从翻译学视角看,知识是翻译活动的核心对象与本质内容,包括语言符号承载的显性知识和隐含于文本背后的隐性知识。从学科构建视角看,知识是翻译学发展的基础,涵盖翻译实践积累的经验性知识和跨学科重构的理论性知识。

客观世界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知识作为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具有发展性。知识的发展性是学科发展的前提,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更新,推动人类社会各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化。知识的发展性要求人们在构建、发展学科的过程中关注客观世界的变化、增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加深对学科的理解,不断发展、拓宽学科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客观世界的变化要求人们的认识 and 知识随之变化、进步,且知识的传播意味着知识总是从地方性知识变为全球性知识,并且在借助媒介全球化过程中有新知识的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动态性的特点。知识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共生的属性要求学科在跨领域和全球化的传播中,注重运用跨学科手段,关注传播和生产知识,以及在传播中生产知识。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涉及多种知识,在促进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推动了新知识的

产生。翻译推动已有知识的传播,促进新知识的生产,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搭建沟通的桥梁,促进研究成果的共享和交流,推动知识的创新与发展。翻译实践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使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及时引进和学习世界前沿科技、创新理念和先进方法,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通过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本国的工业化和知识生产的发展等。这是翻译促进知识传播和生产的重要表现。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始终面临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平衡,理想的翻译需要在保留原文文化异质性与适应目标语读者需求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皮亚杰(Piaget, 1970)的知识建构理论颇具启发性,正如知识产生于主客体的互动,有效的翻译也产生于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对话过程。例如,《文心雕龙》包含大量特色中文意象,施友忠通过三种翻译路径成功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作友等, 2024: 112)。对异域文化的处理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知识传播的关键环节。跨文化实践本身催生了独特的翻译知识体系。本世纪初西方翻译伦理引入中国激发了本土化重构,本土化重构需要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本土语境(胡作友等, 2023: 26)。理论的引进、批判与创新生动展现了翻译如何通过知识生产推动学科发展。

翻译活动传播知识,其显性与隐性特征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翻译学建构包含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的知识体系,使翻译成为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推动跨文化认知的更新与发展。知识的发展性和动态性要求各学科持续演进,翻译学亦不例外。翻译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催生了诸多新兴分支学科(袁丽梅, 2022: 14),为知识翻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知识翻译学提出的知识传播、转换等新概念(杨枫, 2021: 2;严程极等, 2022: 39),拓展了研究视野,推动了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体现了知识演进与学科建设的内在统一性。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维度重新阐释翻译本质,不仅深化了对翻译行为的理解,更为翻译学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翻译本体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对于翻译是什么的回答关乎翻译学的内涵。21世纪初,王春林(2001: 94)将翻译学定义为“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强调翻译学立足于翻译。译学的定义随着翻译概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翻译和翻译学的概念不够明确的原因之一在于翻译本身包罗万象,内容复杂。“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视角多元成为必然。”(范武邱等, 2024: 100)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 2004: 11)认为,翻译学是独立学科。黄忠廉等(2020: 5)将译学的发展归纳为本体译学和关系译学范式:前者是译学的起点,就翻译本身展开学科建设;后者是译学的应用型建设,是对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展开的学科建设。本体译学和关系译学的划分使人们对于译学的梳理和构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当下知识边界不断模糊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学构建无法孤立进行。关系译学的研

究,打破传统翻译研究仅局限于语言转换层面的桎梏。译学积极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汲取养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翻译学注入活力,重塑其研究范式,开辟出一系列崭新的研究路径,极大地拓展了翻译学的知识版图。翻译学要发展,译学本体研究便是其根基,它聚焦于翻译学自身的本质、规律与范畴,深度挖掘翻译过程中的意义传递以及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等核心问题。译学本体的知识生产持续产出具有学科专属印记的知识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翻译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为翻译学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 2 学科内核:本体译学的知识生产

本体译学的构建主要是对翻译学本身的深入思考,包括对翻译概念的元思考、翻译元素的探讨以及在跨学科结合中对于翻译学本身的思考。对翻译概念的元思考可以从大量的翻译概念定义出发,不同的翻译概念出自不同学者的不同思考。翻译元素的探讨主要包括翻译主体的探讨,比如翻译的原则、标准等,以及译者与原作、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研究。更深层而言,它是探究译者与源语和目标语文化背景的思考。

黄忠廉等(2017:7)提出,翻译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探究翻译的本质问题,即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翻译规律,这既是解决各类翻译问题的起点,也是翻译学发展的关键目标。本体译学范式是在实践与经验的不断循环中发展的,也就是在对翻译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发展的。本体译学关注的是翻译本身,譬如翻译中的主体,翻译方法对于译文不同维度的研究等。例如,冯全功(2025:123)通过研究文学翻译修改的多元主体,对译文修改主体进行分类,从而进一步细化、挖掘翻译主体研究的范畴。翻译实践积累相关经验知识,推动学者逐渐开创并发展了翻译理论。黄忠廉等(2020:25)指出,单学科创建路径为学科本体创建路径之一,单学科路径可以按照翻译的几大义素尝试构建翻译学框架,包括译者、符号、变化、文化、目的和类属。以归化和异化为例,之所以出现两种策略的分化,原因在于大量的翻译积累使人们关注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向读者靠拢还是向作者靠拢的问题上,译者对于翻译实践的目的产生思考,直到韦努蒂(Venuti,2001:240)正式提出这两个概念,从此它们得到译界的普遍关注。在韦努蒂的概念提出之前,归化和异化的内涵早已应用于翻译实践中,彼时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也需要对其进行思考,这是翻译实践的知识创造;而当韦努蒂提出概念后,这一知识得到命名,学界开展了广泛研究,这就是翻译理论的知识创造,也就是翻译知识与本体译学的紧密联系所在。

译学单学科创建路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文化转向(Bassnett et al., 1990)。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转向通常指翻译研究领域对文化因素的重新关注和重视,呼吁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考虑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和适应性。文化



转向使翻译研究更加关注文化语境和权力关系(王克非,2024:99)。从译学构建的角度出发,文化转向为本体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与传统的本体译学相比,文化转向为本体译学构建引入了文化差异、文化价值观、文化身份等概念,使得译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能够更全面地考察翻译活动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意义。

文化转向的形成源于社会历史条件与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动。翻译是语言转换行为,在政治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因而政治成为理解文化转向的重要维度(Chen et al., 2014)。在全球政治多极化和自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而外宣翻译作为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战略工具,其规范化和学术化研究直接影响国家叙事能力的提升。缺乏统一标准可能导致翻译失真,削弱国际传播效果,因此中国译界正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构建外宣翻译的规范体系,外宣翻译从实践层面上升为系统的学科知识。苗菊等(2020:105)提出,以谱系法构建政治话语双语术语知识库,使“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概念在多语言体系中形成结构化表达,从而为国际交流提供术语支持与话语分析工具。国家层面出台的《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等标准化文件,从制度上保障了时政术语和公共标识翻译的准确性与一致性,进一步强化了外宣翻译的规范性。这些努力优化了政治传播的精准度,也推动了文化传播的深度发展。李军征(2024:41)对中原非遗泥泥狗的研究表明,外宣翻译需在策略选择与文化内涵传递之间寻求平衡,而刘佳(2023:39)则探索多模态语料库在非遗传传播中的应用,通过数字化存储与交互式呈现实现非遗文化的多维表达。

外宣翻译的学术研究与规范建设相辅相成,形成实践与理论的良性循环。理论探索源于实践需求,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创新,使外宣翻译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同时,也丰富了翻译学科的知识体系,增强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政治外宣翻译和非遗文化外宣研究本质是知识的生产和转化。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了知识生产的土壤;需求驱动下的外宣翻译研究体现了实践知识向理论知识的转化和对翻译学科的构建和丰满;理论研究的成果通过外宣翻译规范的制定和实际应用,推动了外宣翻译实践的提升。外宣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形成知识生产与转化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充实了翻译学科,完善了国家文化传播体系,有助于中国最终实现从“翻译大国”向“翻译强国”的跨越。

通过文化转向的视角,译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提高翻译的质量。充分考虑原文背后的文化因素,使翻译作品更好地融入目标文化,更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对政治文化因素的关注将进一步促进翻译理论的进步。翻译的文化转向和外宣翻译、政治翻译的研究和发展表明了本体译学在这一过程中扩展并细化了翻译实践的领域,并且发展出新的翻译理论,促进了翻译学科的构建和发展。文化转向为本体译学

注入了新的活力,本体译学的发展扩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本体译学的研究内容关注翻译本身。本体学科的构建可以从单学科和超学科的路径出发。从单学科的构建路径出发,翻译的主体译者可以按照不同的群体做出划分,并且在不同主体的划分基础之上进行相应的研究。例如,翻译行为可以分为民间翻译和官方翻译,主体也可以做相应的划分。从知识的角度而言,二者并无本质不同,只在翻译过程处理和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别。民间翻译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出现的翻译主体都值得考量,翻译活动的资助人对于翻译活动的要求,译者自身对于不同文化的掌握、理解和偏好以及读者对于其他文化的接受程度等都属于翻译本体研究的内容。目前民间翻译尚未形成专门以此为名的翻译类别,但是民间各类别,商务翻译、文学翻译等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本体译学的构建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具有三个特点:(1) 知识生产构成翻译学发展的核心动力。翻译实践在两种语言文化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经验积累不断创造新的翻译知识。知识创造既存在于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层面,形成实践与理论互哺的良性循环。(2) 学科发展为知识生产提供结构化路径。无论是单学科深化还是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路径,本质上都是以既有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系统化实践催生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推动翻译学科向更精深的理论层次和更广阔的跨学科领域拓展,最终形成更具综合性的研究体系。(3) 知识传播与创造呈现螺旋上升态势。翻译实践产生的经验性知识通过理论提炼升华为系统性知识,理论成果又反哺实践,指导新的知识创造。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使得翻译知识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成为知识再创造的契机。

### 3 外延创新:关系译学的知识创新

本体译学是译学的一个方面,关系译学的发展是译学的另一个方面。关系译学的构建存在跨学科与交叉学科两条路径,其核心差异在于是否催生新学科以及学科关联是作用于既有学科还是新生学科(黄忠廉等,2020:28)。以社会翻译学为例,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学理论单向赋能翻译学研究,即借助社会学的宏观理论框架分析翻译活动的社会功能,但未形成双向融合的新学科体系。单向性导致其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均以社会学为主导,而对社会学本体的反哺有限,因而被定义为“从翻译研究立场出发,借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探索翻译与社会关系”的跨学科产物(傅敬民等,2023:7)。

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生动体现了跨学科知识创造的路径。其核心命题译者的社会性植根于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知识交汇,而图里(Gideon Toury)的规范论正是跨学科实践的标志性成果。规范论将社会学中的规范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揭示翻译行为受社会规则制约

的本质。切斯特曼在规范论基础上提出的翻译伦理理论,不仅完善了翻译社会性研究的理论链条,更推动了关系译学在知识创新层面的发展,即通过学科间概念的移植与重构,实现了从单向理论借用到双向知识增殖的演进。

关系译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知识的积累与跨学科的融合,其中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翻译学的互动尤为典型。计算机学家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首台计算机问世仅一年后,便前瞻性地提出机器翻译的设想。机器翻译的设想不仅预示了计算机技术与翻译学的结合,更成为关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早期范例。此后数十年间,计算机科学的突飞猛进不断推动着机器翻译模型的迭代更新,而翻译学也在与计算机技术的联动中实现了质的飞跃。时至今日,计算机辅助翻译已成为翻译实践的核心工具,其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翻译效率与准确性,深刻改变了传统翻译模式,充分展现了跨学科融合对翻译实践的变革性影响。

跨学科趋势在翻译研究领域同样表现显著。方梦之(2024:1)指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步伐显著加快,涌现出生态翻译学、翻译美学、社会翻译学、认知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一系列创新成果。其中,生态翻译学尤为突出,它将翻译与生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学术话语体系,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傅敬民,2023:34)。翻译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不仅拓展了翻译学的理论边界,更从不同维度深化了翻译与社会、技术、认知等领域的关联。从学科构建的角度看,关系译学的发展正是通过跨学科互动,不断强化翻译学的社会联系,推动翻译研究向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延伸。可见,关系译学的演进始终依托于知识的交叉与创新,无论是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还是生态学、社会学等理论的融合,都在不断丰富翻译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的学科体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呈现出知识交融的显著特征。王晓睿等(2024:102)指出:“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综合学科,翻译学的发展历程离不开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与借鉴。”关系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正是通过吸纳多元学科知识来推动学科创新与知识生产。关系译学发展的过程中,对翻译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拓展。传统上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而雅克布森(Jakobson, 2000:113)的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的三分法则突破了语言的局限,将翻译概念延伸至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它的启示是如果语内重述被视为翻译,那么学科间的知识转述同样具有翻译属性。当某一概念在不同学科间流转时,其意义的重新阐释往往催生新的知识生长点。

跨学科的知识迁移凸显了“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知识的跨学科流动本质上是其世界性特征的体现,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知识创新,既包括原创性的新知,也涵盖通过学科交叉产生的异质化知识形态。因此,在评估知识创新时,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



将跨学科知识转化纳入考量范畴,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关系译学发展中的知识创造机制。

晚清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长期隔绝于世界发展潮流,直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进步知识分子才开始系统译介西方先进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思想引入中国,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更成为知识跨语言传播的典范,推动了地方性知识向全球化的转化,而西方学者斯宾塞将进化论与社会学结合创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展现了知识跨学科重构的创造性。在翻译学领域,进化论思想同样催生了新的理论突破。胡庚申(2004:62-63)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以“翻译适应选择”为核心概念,创造性转化了“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将其运用于解释翻译现象。跨学科移植既保留理论框架又赋予新内涵的属性,体现了知识的全球化流动,彰显了翻译学在吸收外来理论过程中的创新性发展。从语际翻译到学科互鉴,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重构,完整呈现了知识在跨语言、跨学科转换中的创造性转化历程。

翻译伦理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论范式,其发展轨迹生动展现了跨学科知识迁移与重构的完整过程。翻译伦理理论被引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并未止步于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本土化阐释。李征(2022:14)对翻译伦理的元思考体现了理论自觉,他梳理了西方翻译伦理的理论脉络,立足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特殊性,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发展。李征对翻译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正是知识全球化传播的典型特征:伦理学概念进入翻译学领域后,通过与本土学术传统的对话,催生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 4 知识生产的整合逻辑:本体与关系的辩证统一

跨学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人工智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从计算机辅助翻译到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革新不断塑造着翻译实践的面貌。王华树等(2021:91)指出,AI技术既带来了翻译效率的革命性提升,也引发了关于技术理性的深刻反思,因此必须超越简单的工具主义视角。王均松等(2023:14)系统考察了翻译模式的历史嬗变,提出构建人机和谐共生生态的构想,其核心在于以人本理念引领技术创新,同时注重译者的技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协同发展。

技术进步的伦理维度在翻译研究中日益凸显。陆艳(2024:117)构建了完整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伦理框架,通过引入预见理念、人机协同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确立了算法伦理、人机交互伦理和生态伦理,回应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还将翻译伦理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上述研究虽然聚焦于不同层面,但都体现了共同的学术取向:在吸收伦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旅行到人工智能时代伦理重构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关系译学的知识创新。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传统伦理的现代化转型、人机关系的系统性思



考,这些研究表明,关系译学的发展既依赖于跨学科的知识迁移,又需要知识迁移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地方性知识通过学术对话融入全球知识体系,而全球理论也在本土实践中获得新的内涵,形成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良性循环,为应对新技术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翻译研究历经不同范式的演进,从最初关注语言转换的本体译学,到考察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译学,再到聚焦跨文化知识流动的知识翻译学,其理论发展始终与知识生产紧密相连。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递进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翻译研究的完整理论体系。

本体译学以语言转换为核心,探讨翻译的“可译性”“对等性”等基本问题,其核心任务是确保源语知识在目标语中的准确再现。例如,科学术语的翻译必须严格遵循专业规范,否则可能导致知识传递的偏差。因此,本体译学是知识生产的基础性环节,它决定了知识在跨语言迁移过程中的保真度。然而,本体译学往往将知识视为既定存在,默认源语知识可以直接移植到目标语中,忽略了知识本身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重构。关系译学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网络中考察,强调翻译行为受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赞助机制等外部因素影响。例如,西方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可能有意无意地融入基督教思想,从而改变原文本的知识结构,改写并非语言问题,而是知识被重新塑造的结果。

关系译学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知识生产的非中立性,然而,它较少关注知识本身的认知逻辑和系统性,因此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框架来揭示翻译与知识创新的内在联系。知识翻译学的突破性在于,它将翻译视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而非被动传递工具。其核心观点包括翻译是知识的创造性重构,翻译推动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翻译促进跨文明知识融合。知识翻译学既吸收了本体译学对语言精确性的要求,又继承了关系译学对社会语境的敏感性,但其独特价值在于,将知识生产作为翻译研究的终极目标,从而超越了前两者的局限性。在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中,三者各司其职,相互支撑。本体译学确保知识在语言层面的准确性;关系译学揭示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博弈;知识翻译学最终实现知识的创新性转化。

## 5 结语

翻译学构建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其理论框架的完善既依赖于本体译学的纵深发展,也得益于关系译学的横向拓展。从学科发展逻辑来看,本体译学通过对翻译本质的元思考奠定学科根基,如文化转向和知识翻译学等理论突破,正是学者们对翻译活动本质认识的深化。对学科本体的持续探索,为关系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土壤。

关系译学的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一方面,它吸收其他学科的新知来拓展研究视域;另一方面,跨学科融合又反过来促进对翻译本质的再认识。本体译学对翻译本质的

探索必然触及其他学科的交叉地带,从而催生关系译学;关系译学通过引入多学科视角,为本体译学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此过程中知识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本体译学层面,知识源于翻译实践的积累和提炼,通过概念界定推动理论发展;在关系译学层面,知识则表现为学科间的迁移与重构,既保留原学科的核心要义,又在翻译语境中获得新内涵。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翻译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生动展现了知识在促进学科融合中的桥梁作用。

翻译学的构建是一个知识生产与转化的过程。本体译学通过对翻译本质的持续探索,形成学科的核心知识体系;而关系译学则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迁移与重构,拓展了学科的边界与内涵。两种知识生产方式相互依存、彼此促进:本体译学为跨学科知识迁移提供理论根基,关系译学则通过引入新视角不断丰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知识与理论、本体与关系的辩证互动,推动了翻译学的理论建设,更使其具备了应对当代复杂挑战的方法论基础。

#### 参考文献:

- Bassnett, Susan & André Lefevere.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Pinter.
- Chen, Y. & J. J. Huang. 2014. The Culture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Open Journal of Modern Linguistics* (4): 487-494.
- Jakobson, Roman. 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M]//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8-113.
- Piaget, J. 1970.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M]. W. Mays. tr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Venuti, Lawrence. 2001.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M]//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范武邱,阳海清. 2024. 学科演进中的翻译理论概念探析[J]. *中国外语* (6): 94-101.
- 方梦之. 2024. 跨学科译学研究的三个交叉中枢[J]. *上海翻译* (2): 1-6.
- 傅敬民,李亚峰. 2023. 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借鉴与创新[J]. *外语教学* (5): 7-13.
- 傅敬民. 2023. 行动·系统·功能——生态翻译学研究[J]. *中国翻译* (5): 26-34.
- 冯全功. 2025. 文学翻译修改的多元主体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作品的译者多元性特征[J]. *外国语文* (4): 114-124.
- 胡庚申. 2004.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62-63.
- 胡作友,彭九州. 2023.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J]. *中国翻译* (2): 26-34.
- 胡作友,孙晓璐. 2024.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 (3): 112-123.
- 黄忠廉,方仪力. 2017. 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J]. *中国翻译* (4): 5-10.
- 黄忠廉,王小曼. 2020. 翻译学科双轨创建范式论[J]. *中国翻译* (3): 23-30.
- 黄忠廉,张潇. 2020. 翻译学科百年: 演进、反思与趋势[J]. *上海翻译* (6): 1-6.
- 李军征. 2024. 中原非遗外宣翻译研究——以淮阳泥泥狗为例[J]. *上海翻译* (3): 36-41.
- 李征. 2022. 元翻译伦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石[J]. *上海翻译* (3): 14-20.
- 刘佳. 2023. 数字化赋能非遗对外传播多模态语料库平台构建研究[J]. *上海翻译* (6): 34-39.

- 陆艳. 2024.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伦理构建[J]. 中国翻译(1): 117-125.
- 梅明玉,何燕,胡超. 2024. 中医脉象学核心术语英译标准化探析[J]. 中国翻译(3): 152-159.
- 苗菊,牛军. 2020. 政治话语双语术语知识库的谱系法构建——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术语体系为例[J]. 中国翻译(2): 99-106.
- 王春林. 2001. 科技编辑大辞典[M].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 王华树,刘世界. 2021.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转向研究[J]. 外语教学(5): 87-92.
- 王均松,肖维青,崔启亮. 2023.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驱动的翻译模式:嬗变、动因及启示[J]. 上海翻译(4): 14-19.
- 王克非. 2024. 关于翻译的几组概念[J]. 外语导刊(1): 98-105.
- 王姗姗,郑龙威. 2024.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术语英译研究[J]. 中国翻译(5): 156-163.
- 王晓睿,王斌华. 2024. 全球化、数字化与跨学科背景下国际翻译研究的挑战与发展[J]. 中国翻译(1): 102-107.
- 王贇,张政. 2024. ChatGPT 人工智能翻译的隐忧与纾解[J]. 中国翻译(2): 95-102.
- 严程极,杨枫. 2022. 知识翻译学的知识渊源[J]. 上海翻译(6): 39-43.
- 杨朝军,炎萍. 2023.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J]. 外文研究(3): 82-88,97,109.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5): 2,27.
- 袁丽梅. 2022. 知识翻译学的理论立场与批评视角——由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说起[J]. 当代外语研究(4): 13-21.

##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U Zuoyou DOU Jincha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s a core medium for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 not only facilitates language conversion and knowledge reproduction but also promotes disciplinary systematiz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Knowledge-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gards knowledge a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translation, emphasizing its pervasive role throughout the entir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paradigm shifts in the discipline. The epistemological attribut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haracterized by developmental and dynamic features, necessitate continuous disciplinary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nt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focuses on meta-reflections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deepen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rough research on cultural turns and related approaches. Rel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expand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Ont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provides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while Rel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enrich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is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dep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sociocultural challenges, demonstrating the discipline's vita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ont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rel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Knowledge-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责任编辑:陈宁